



窮理致知

## 從〈橫山疏〉略談司馬光的戰爭觀

● 施寬文\*

宋仁宗寶元元年（1038），西夏李元昊稱帝，採取聯遼抗宋之戰略，雙方攻戰不斷，而宋軍大多敗績，直至慶曆四年（1044）雙方議和，才使干戈載戢。其後除了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）的麟州斷道塢之役，造成宋軍數百人傷亡的較大衝突之外，宋夏之間維持了二十年的和平。治平四年（1067）元月，英宗病逝，年方二十的宋神宗趙顛正式聽政，銳意求治，尤其措意於失土之收復，因此，踐祚半年即信用主戰之薛向，「凡向所陳計策，帝皆令勿語兩府，自以手詔指揮。」<sup>1</sup>乾綱獨斷，一心想要重啟戰端。當年十月，宋將种諤遂以詐謀收復綏州，神宗大受鼓舞，以為滅亡西夏有望。司馬光則在九月三次上疏極諫（即〈橫山札子〉、〈橫山疏〉、〈橫山上殿札子〉），而神宗不聽，執意重燃戰火，其後兵燹連年，史家以為宋朝「西方用兵自此始」<sup>2</sup>！

司馬光在〈橫山疏〉中極力諫阻用兵西夏，因為神宗復諫，宋夏戰爭遂持續三十餘年，其間有元豐五年（1082）的永樂城之役，宋之軍民喪亡數十萬人，神宗因之「涕泣悲憤，為之不食。早朝，對輔臣慟哭。」<sup>3</sup>司馬光〈橫山疏〉所論，的確有其先見，其所諄諄致意者在於「先修內政，未可輕議用兵」，實切合北宋當日情勢。惟哲宗元

\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。

<sup>1</sup> 英宗治平四年六月：「向在英宗時，嘗獻《西陲利害》十五篇。去冬又上疏陳禦邊五利：一曰任將帥以制其衝，二曰亟攻伐以罷其敵，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，四曰絕利源以敝其國，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。疏奏，英宗稱善，嘗置諸左右，帝見而奇之。會邊臣多言橫山族帳可招納者，是日，召向入。凡向所陳計策，帝皆令勿語兩府，自以手詔指揮。」〔清〕畢沅：《續資治通鑑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7），卷65，頁1602。

<sup>2</sup> 〔清〕畢沅：《續資治通鑑》，卷65，頁1610。

<sup>3</sup> 〔清〕畢沅：《續資治通鑑》，卷77，頁1931。



祐元年（1086），司馬光身居揆席，固執禮義道德的觀點，認為神宗時期宋朝趁西夏內部不安而出兵攻掠，實非仁義之舉，而有還地之議，即史稱「元祐棄地」。當時宋廷中正反雙方爭論激烈，後來雖未割棄蘭州重鎮，卻仍歸還米脂、安疆、葭蘆、浮圖四寨予西夏，欲以之換取和平。此事之利害得失，後世猶有爭議，此不贅論，惟因此認為司馬光之反戰乃因其為人迂腐，醜詆為政治庸才，則有待商榷。

儒家思想以「仁」為主，非議戰爭之「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；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」，指責居位好戰者實「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於死」（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）。以戰爭之暴行實與「仁者愛人」之義大相逕庭，因此，儒者一向不輕言、不喜言戰爭之事。<sup>4</sup>雖然如此，儒者絕非無條件的反對戰爭，孔子：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」（《論語·季氏》）既云征伐可自天子出，可明孔子並不盲目反戰；此外，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亦載定公十三年，孔子命申句須、樂頎討伐逆命作亂的費邑人<sup>5</sup>，則在正當合理的前提下，儒者甚至支持主動發起戰爭。

司馬光為北宋大儒，其奏疏中每見諫止用兵征伐之事，而其所撰《資治通鑑》，則特詳於軍事、戰爭之記載，對於兵法、謀略，往往覩縷詳敘之，而為顧炎武所稱道。<sup>6</sup>前者蓋因其所遵奉之儒學思想，後者則導因於所處時代之屢困於遼、夏外敵，故特別留意之。相對於「迂腐」、「政治庸才」之詆譏，司馬光也被稱譽為「務實」的政治家、史學家，具有實際從政經驗的司馬光，其對於戰爭的態度，並非主張在任何衝突中不應使用戰爭手段的極端反戰者，而是主張量時度力，在正當合理、情勢許可時，才發動戰爭，此於〈橫山疏〉中可以睹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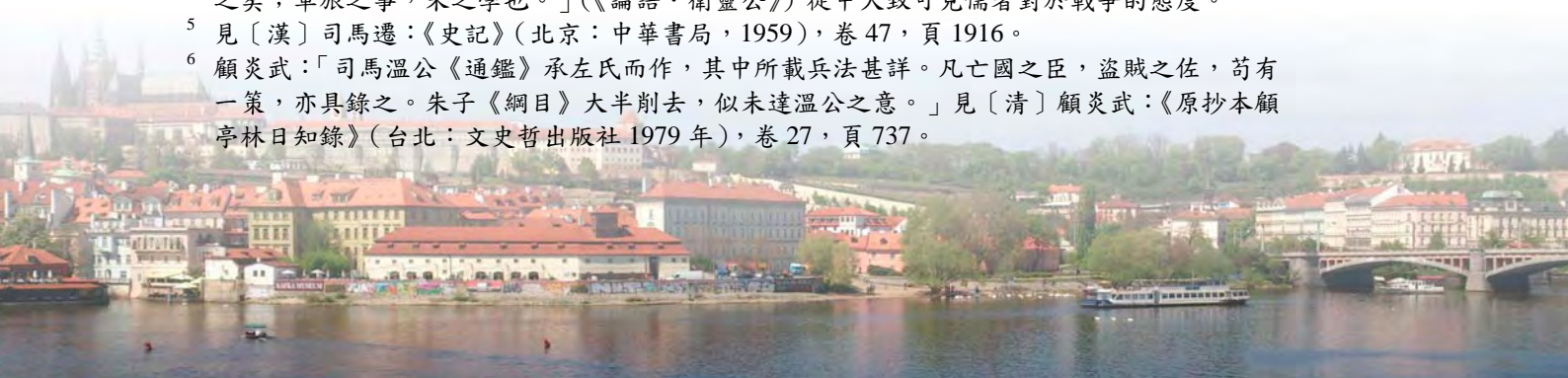
〈橫山疏〉全文約莫二千五百字，參閱其前、後的〈橫山札子〉、〈橫山上殿札子〉，其論述重點在於：一、敵我實力對比；二、用兵合理性；三、內政為先與用兵時機。

就第一點的「敵我實力」而言，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所上的〈橫山札子〉已簡要

<sup>4</sup> 如孔子回答子貢之問政，標舉「足食，足兵，民信」，當子貢進一步追問「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」時，即以「去兵」為先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；又，衛靈公問陣，孔子亦答以：「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；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」（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）從中大致可見儒者對於戰爭的態度。

<sup>5</sup> 見〔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），卷47，頁1916。

<sup>6</sup> 顧炎武：「司馬溫公《通鑑》承左氏而作，其中所載兵法甚詳。凡亡國之臣，盜賊之佐，苟有一策，亦具錄之。朱子《綱目》大半削去，似未達溫公之意。」見〔清〕顧炎武：《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），卷27，頁737。





提及宋方「公私困匱，軍政未講」<sup>7</sup>，二十四日繼上的〈橫山疏〉，則具體詳述之。除了提及党項習俗自幼即習兵，「善忍饑渴，能受辛苦，樂鬪死而耻病終。」為「中國之民所不能為」之外，也指出雄才大略的宋太宗討伐西夏十餘年猶不能克，徒使「白骨蔽野，號哭滿道」，而當時「天下新平，民未忘戰」；今日則國庫空竭，關中百姓，自經西夏戰事以來，元氣猶傷，而且，當日宋軍「承平日久，戎事不講，將帥乏人，士卒驕惰，上下姑息，有如兒戲。教閱稍頻，則愠懟怨望；給賜小稽，則揚言不遜。被甲行數十里，則喘汗不進；遇鄉邑小盜，則望塵奔北。」<sup>8</sup>戰力薄弱如此，豈可輕易向西北悍敵宣戰？！

第二點「用兵合理性」，〈橫山札子〉指出趙諒祚（即西夏毅宗李諒祚）雖然內心桀驁，但「外存臣禮」，宋方如輕啟戰端，於理有虧，「失王者之體多矣」。〈橫山疏〉則進一步詳述之，指出趙諒祚在治平三年攻大順城、殺掠吏民時可以征討，如今既已赦免其罪，再「誘其叛臣以圖之」，即使獲勝也是可恥，結論仍在對西夏用兵沒有正當合理性。

第三點「內政為先與用兵時機」，此是疏中所最為強調者，不僅〈橫山札子〉提及「以拊循百姓為先」，主張對西夏採取守勢，也提及伺西夏罪惡顯著，而「中國兵穀有餘，然後奉辭伐罪」；〈橫山疏〉就此具體陳策，除了政治經濟上的「收拔賢俊，隨材受任，以舉百職」、「有功必賞，有罪必罰，以修庶政」、「慎擇監司，澄清守令，以安百姓」、「屏絕浮費，沙汰冗食，以實倉庫」；在軍事方面，則「詢訪智略，察驗武勇，以選將帥」、「申明階級，剪戮桀黠，以立軍法」、「料簡驍銳，罷去羸老，以練士卒」、「完整犀利，變更苦窳，以精器械」；待政治、經濟、軍事之準備皆已完妥，則「惟陛下之所欲為，復、靈、夏，取瓜、沙，平幽、薊，收蔚、朔，無不可也。」<sup>9</sup>此意在上〈橫山疏〉三天後的九月二十七日之〈橫山上殿札子〉又第三次強調：「舉百職，修庶政，安百姓，實倉庫，選將帥，立軍法，練士卒，精器械，然後觀四夷之釁；亂者取之，亡者侮之，何患不能復大禹之故迹，雪祖宗之宿憤也？」<sup>10</sup>司馬光之所以一再諫止用兵西夏，實非死守道德教條而迂腐反戰，而是認為當時內部情勢根本不允許，一旦

<sup>7</sup> 李之亮：《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9），冊3，頁511。

<sup>8</sup> 李之亮：《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》，冊3，頁512、頁513、頁517、頁518。

<sup>9</sup> 李之亮：《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》，冊3，頁519。

<sup>10</sup> 李之亮：《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》，冊3，頁525。



內部安妥完聚，則觀釁伺隙，等待時機成熟，即可以堂皇出兵，以雪宋室先人之憤。

孟子對答齊宣王問取燕與否時，云：「取之而燕民悅，則取之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悅，則勿取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，箝食壺漿，以迎王師，豈有他哉？避水火也。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章句下》）又，答萬章問宋如何應對齊楚之伐時，云商湯：「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。東面而征，西夷怨；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，曰：『奚為後我？』民之望之，若大旱之望雨也。」（《孟子·滕文公章句下》）其中雖論爭戰之事，重點實在政治。戰爭之勝負、取勝後的持盈守成，皆離不開政治，儒者則以為「仁政」之施行最為重要。司馬光對於戰爭的態度，亦以政治為先，認為我之政治安定，民心凝聚，國家富足，軍力可恃，而敵反之時，則自可出兵討伐之，否則即不宜輕言動武。觀其上〈橫山疏〉之後十五年發生的「永樂城之戰」，宋軍大敗，軍民喪亡數十萬人，則其當日反對對西夏開啟戰端，實非迂腐反戰，而是務實非戰。

